

舊文物，新認同 ——《四庫全書》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

林志宏**

摘 要

編纂《四庫全書》是清代重要的知識和文化活動之一。這部叢書的命運並非止於清代，在民國時仍然備受矚目。它自象徵朝廷事業的光榮，成為國家文物；經由印刷、出版和傳布，被賦予傳承「國粹」的文化功能，化身為新的民族國家之認同。本文以四部份進行論證。首先，從文物到出版品的歷程，討論《四庫全書》失去舊王朝所具備的神聖意義。第二部份探究出版事業的政治性，以商務印書館為例，隨著 1920 年代的「圖書館運動」、國民政府的「中央化」機關建置以及日本侵華等因素，文物出版的工作因此提供新的認同基礎，同時開啓選印《四庫全書》的契機。第三部份針對 1933 年刊印《四庫全書》的爭論，釐清知識專業化在國家建設中的影響。最後，連結《四庫全書》的角色到戰爭與民族主義間的關係，強化認同之意義。具體而論，《四庫全書》在民國時期的軌跡，實為一部二十世紀中國蛻變為民族國家的歷史。

關鍵詞：《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袁同禮、蔣復璁、國族認同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1930 年代中國的新傳統與主義崇拜：以華北地區為例」(NSC98-2410-H-001-001-MY2)之部份研究成果。初稿宣讀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理念、學科、出版、社群」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2 月 16-17 日)，席間承蒙評論人董玥教授、與會張壽安教授指正，減少許多疏漏。審查期間，復得三位匿名審查人與集刊編委會提供諸多寶貴意見，在此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11 年 3 月 3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 年 6 月 7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前 言

編纂《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是清代乾隆帝時期重要的學術和文化活動。該項工作自 1773 年開館修書，至 1781 年底完竣，歷時九年。這部堪稱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官修叢書，其地位和意義毀譽參半；除了繼承古代「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外，還象徵統治者如何運用文化手段，以查禁書籍控制人們思想，達成政治目的。¹

如此政治與文化交織下之活動，對後世的影響難以言喻。大致從乾隆後期開始，中國知識界即深感《四庫》編纂事業所帶來的深沉壓力。十八世紀末，章學誠(1838-1901)提到當時史冊著錄情形，是「以欽定《四庫書》入史部者為主」，因此「不見於《四庫》著錄，不敢登也。入《四庫》之著錄而不隸於史部者，亦不敢登」，²可知《四庫》儼然成爲歷史編纂最主要的標準。而《四庫》在中國造成的學風，不特史學如此，1921 年顧頡剛(1893-1980)還有類似的觀察：

在讀書方面，如周中孚仿《提要》作《鄭堂讀書記》。在刻書方面，如《守山閣叢書》錄自《四庫》原本者甚多。在輯書方面，則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數百種，引起學者輯書之風尚。在校書方面，如馮桂芬〈思適齋文集序〉云：「朝廷開四庫館，徵海內遺書，以是古籍之出尤多。〔顧廣圻〕先生名既重，海內藏書家得異本，必就先生相質。……」在編目方面，如《持靜齋書目》以《四庫》著錄者頂格，《四庫》未著錄者低一格；分類一切依《提要》。又巴陵方氏碧琳瑯館、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均依《四庫》排次。北大購書方氏書極

¹ 清末民初的章太炎(1869-1936)執此說法最力，也成爲日後探討清代政治與文化課題的論點之一。見章太炎，〈哀焚書〉，《檢論》，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卷3，頁467-469。

²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史考釋例〉，頁441。這篇文章寫於1798年。

多，書面均打有「四庫著錄」、「四庫附存目」等朱印。³

顧氏檢討十九世紀後與《四庫》有關的箇中實況，或許過於簡化，卻也凸顯了《四庫》在人們心中所占之地位。是以，探析晚清民初知識階層內心的「四庫學」，⁴為吾人釐清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及文化變遷，提供一條可循途徑。

然而，以往研究《四庫》的學者，比較重視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甚少關注其後續發展。即便有之，大抵以「附錄」或「註記」說明，⁵乃至編製檔案、辭典及索引目錄，⁶範疇不外乎在出版史方面。⁷進一步論析「後四庫」時代的知識文化史，迄今仍乏深刻探究。

《四庫》的命運並非止於有清一代，直到民國依然餘波蕩漾，在現代「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過程裡，仍是眾所矚目的焦點。它自原來象徵朝廷的光榮事業，轉而成為國家的文物；經由印刷、出版和傳布，被賦予傳承「國粹」的文化功能，化身為新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認同代表。藉由《四庫》為例，這篇文章希冀反思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問題。

為了呈現《四庫》這項舊文物如何發展出新認同，本文除了前言及結論外，將以四部份進行探討。在第一節裡，筆者論析從文物到出版品的歷程，當中包

³ 顧頡剛，〈《四庫全書》造成之學風〉，《顧頡剛讀書筆記》（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卷1，頁189-190。

⁴ 關於民國時期討論《四庫》問題，不但風氣鼎盛，且涉及範圍相當廣泛，更超越了清代的認識。論者曾指出大致朝向四個方向（分別為：從事版本的探討、訂正〈提要〉的錯誤、論述《四庫》纂修的經過、呼籲續修或影印四庫全書），代表所謂「四庫學」之發展。筆者雖未必完全同意「四庫學」一詞用法，可是認為確有值得進一步追索的意義。見劉兆祐，〈民國以來的四庫學〉，《漢學研究通訊》，卷2期3（1983年7月），頁146；陳東輝，〈20世紀上半葉「四庫學」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卷25期2（2006年5月），頁29-38。

⁵ 例如：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上海：上海書店據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37年版影印，1990）；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兩書討論有關民國時期《四庫》問題，均放在附錄中。

⁶ 民國時期最先開啓挖掘《四庫》的史料和檔案，係陳垣和王重民。見汪受寬、劉鳳強，〈《四庫全書》的研究回顧與思考〉，《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1期，頁63。迄今與該議題相關的索引工具書，應屬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慶彰主編的《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一書最為完備。

⁷ 相關研究頗多，最新的一本著作是：李常慶，《四庫全書出版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括兩次官方發起刊印活動，又有各方勢力的利益糾葛。這些個別事件看似紛歧，卻說明《四庫》逐漸脫離原來王朝時代所具備的神聖意義。第二節則集中處理出版事業本身的政治性，以商務印書館為例，陳述其時代氛圍與印行《四庫》之始末。該館以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的優勢，本欲藉《四庫》傳遞古典知識和文化理想，結果遭到現實的政治因素所阻撓。不過，隨著幾次失敗的經驗，出版舊文物的文化工作卻慢慢產生新的認同基礎，特別是 1920 年代的「圖書館運動」、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央化」機關建置與「國難」環境下，逐步開啓選印《四庫》的契機。第三節部份，針對 1933 年刊印《四庫》個案，釐清知識專業化在國家建設中的影響。這場由國府主導的文化事業，雖然引發南北不同學術社群的交鋒，究其實還蘊含各種認同（中央 / 地方、政府決策 / 知識專業……等）間的分歧。最後一節內容，筆者繼續把《四庫》的舊文物角色，放在更廣的戰爭與民族主義互聯關係上，強化認同所展現之意義。1930 年代中、日兩國政治、外交日趨緊張之下，無論是《四庫》的出版工作，還是文物搬遷，都有強烈民族情感及認同的因素存在，其中不乏牽涉到各地地方認同之複雜關係。具體而論，《四庫》在民國時期的活動軌跡，不啻一部書寫中國在二十世紀蛻變為民族國家的歷史縮影。

進入正文前，先就讀者可能產生之疑慮略作交代。首先，擬闡釋標題字義。《四庫》雖屬清代典籍，但民國業已具備文獻意涵，甚且被視為古物之一。究其實，民初時期對此並無特定用法，檔案有關「古物」、「文獻」及「文物」經常並行；然而為避免討論時讀者對文字使用產生混淆，除了必要之外，一律將文獻、古物等語詞，統稱「文物」。其次需要說明，《四庫》在清代一共抄有七部，分別藏於各地，⁸直到民國僅剩四部（文淵、文津、文溯、文瀾）。

⁸ 1774 年 6 月，《四庫》編纂工作甫大規模展開時，乾隆皇帝即開始考慮如何儲藏修畢的典籍。後來他決定模仿浙江寧波的天一閣，建造文津、文源、文淵、文溯內廷四閣（一般簡稱「北四閣」），分別設在熱河承德的避暑山莊、北京圓明園、北京紫禁城及遼寧盛京（今瀋陽）故宮裡。1782 年，又下令追加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和杭州聖因寺行宮的文瀾閣（一般簡稱「南三閣」），目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書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見李常慶，《四庫全書出版研究》，頁 33-34。

根據相關討論與資料可知，即使存留下來的四部同名叢書，彼此抄本的內容也互異，不可混為一談。但本文所論題旨，並非庫書中之內容，故以下行文實將《四庫》視為整體來談，在必要時才標舉館藏閣本。復次，本文內容雖涉及《四庫》出版與搬遷，卻無意覆述既有的研究成果。事實上，從 1930 年代郭伯恭 (1905-1951) 開始，乃至近期的黃愛平、李常慶等學者，都已詳述《四庫》出版在民國初年的曲折歷程，此處毋寧站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追索，焦點是有關民族國家的認同課題。最後要說明研究時限和引用史料。這裡所談的「民國時期」(Republican China)，係指 1949 年以前的民國政府，其中包括了北洋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至於使用資料，大抵來自公、私領域兩方面。公共部份是有關報紙（特別是《北平晨報》、《申報》、《中央日報》等）和雜誌上的言論、記載；而私人部份，則為當事者的日記、書信，乃至日後相關的回憶文字。

一、告別朝代遺產：《四庫》的文物國族化及其波折

探析《四庫》在民國以後的命運，應先理解其本為朝代文化事業的光榮象徵；只是共和政府成立後，此一昔日深具「彝器文獻」的神聖意涵，需要因時制宜，重新喬裝改扮，以新的面貌示人，並做為闡揚與保存文化的工具。

澄清這一段變化，應對近代中國「古物」的意義稍加說明。大體說來，二十世紀初中國歷經滿清到民國的政體變革，也使得文物在傳統「好古之風」的學術環境裡，出現三種有別以往的發展。第一是由官方主導，以法令來界定古物種類和持有問題，目的乃利於「國有化」工作。第二，透過公共輿論，重新檢討何謂「古物」，進而提出維護、收藏和研究的意見。最後則係針對收藏問題，設立保存的博物館或相關鑑賞機構。上述三面向無疑均與近代民族主義的運動及風潮有關，經由文物的「國族化」，試圖建立對「中國」的新認識，且納入民族國家之一部份。⁹根據 1916 年 10 月內務部的〈古物調查說明書〉分

⁹ 關於這三個面向，非常感謝王正華教授的提示。有關討論，亦可參考吉開將人，〈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文物事業の展開——制度的変遷を中心に——〉，《歴史学研究》，號 789（2004 年 6

類可知，¹⁰《四庫》隸屬於「文獻類」。它從北洋政府起，即開啓了「告別朝代遺產」而邁向「文物國族化」的歷程。

（一）舊文物《四庫》的新發展

清廷倉促宣布退位，諸多公務頓時難行。有的機關爲了避免政權轉移時發生困難，紛紛求助於共和政府，或是委請相關的部門代行管理。¹¹各項業務進行移交或接收過程裡，清室典藏的文物特別得到時人關注，《四庫》更係目光焦點所在。

試以存放在熱河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本爲例。本來 1909 年清廷籌設京師圖書館時，一度考慮將此庫書移交管理，嗣後革命事起，延宕未果，直到民國肇建才被再度重視。1913 年 6 月 27 日，教育部以接管清朝學部檔案及卷宗爲由，要求也將文津閣本移至京師圖書館存放，¹²構想始獲落實。惟江山易主，政隨人轉，不免產生諸多窒礙；由於清室內務府居間阻撓，文津閣本最先運往北京的古物陳列所，無意交給教育部。¹³此一結果，引來時任京師圖書館館長的夏曾佑(1863-1924)關注，趕緊派員接洽，辦理點收事宜。¹⁴

月），頁 52-62；史勇，《中國近代文物事業簡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

¹⁰ 調查古物表裡共分有十二類：建築類、碑碣類、金石類、陶器類、植物類、文獻類、武裝類、服飾類、雕刻類、禮器類、雜物類等。見〈內務部擬定保存古物暫行辦法致各省長都統飭屬遵行咨〉，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文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 201。

¹¹ 像是基於皇宮內的圖書不易保存，1912 年清室特派世續(1852-1921)親訪共和政府的教育總長蔡元培(1868-1940)，商議中華民國創設大型圖書館，願提供宮中所藏四庫不下數萬種的書籍，希即派員接收保管。當時蔡氏對清室此舉曾經深感謝意，表示「俟指定地點館工告峻，再爲接收」。之後由於蔡個人的因素離開教育部，此事遂無疾而終。事見〈專電·北京電報〉，《民立報》，1912 年 7 月 1 日，第 3 頁。

¹² 〈關於京師圖書館接收文津閣四庫全書的交涉函件〉，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207。

¹³ 當時任職於教部的魯迅（周樹人，1881-1936），其日記有段記載：「晨教育部役人來云，熱河文津閣書已至京，促赴部。遂赴部，議暫儲大學校，遂往大學校，待久不至，詢以德律風（按：即電話的英語音譯），則云已爲內務部員運入文華殿，遂回部」，可見當中彼此暗爭之激烈。魯迅，《魯迅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頁 80，甲寅正月六日條。

¹⁴ 〈關於京師圖書館接收文津閣四庫全書的交涉函件〉，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頁 206-207。

移交過程體現從帝國到民國有關文物產權的問題，為日後各方勢力爭奪《四庫》及其出版事業蹉跎之由揭開序幕。同時，該事件也顯現一項迷思：兼有傳統文獻及典籍身分的文津閣本，仍被視為識字階層專有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尤其《四庫》原屬官方帶動抄錄、輯佚之文化事業，更超越了文化資本的價值，提升到一種神秘、神聖色彩，帶有呂思勉(1884-1957)所謂「重器」的性質。¹⁵因此，民國初期許多具有舊學基礎和文化素養的人，依舊拋不開對《四庫》的莫名孺慕之情。

日後身為民國第二任大總統的徐世昌(1855-1939)，即是代表人物。他在1917年時，風聞上海的猶太商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家族有意從事校印《四庫》工作，特撰書聯贈賀，共襄盛舉。儘管此舉因哈同的國籍遭阻，¹⁶卻埋下後來徐氏有意落實辦法，成為官方印行之先驅者。

1919年冬天，徐世昌授命金梁(1878-1962)編纂紫禁城內文華、武英二殿所陳列的古物目錄。隨著內務部積極調查文物的同時，金梁馬上警覺《四庫》之重要性，趁勢提議印行《四庫》，並將全書謬誤、卷帙分割等問題，略作校勘，同時草擬續修書目。¹⁷徐氏基於「重器」觀念，在高喊「闡揚文化」的口號下，委派朱啓鈞(1871-1964)督辦。根據〈大總統令〉，印行《四庫》的理由，一方面是擔心戰亂中文物有「淪散之虞」，另一方面則為了「沾溉中外人士」，宣揚國家文化。¹⁸

〈大總統令〉強調《四庫》刊印具有「保存文物」和「宣揚國威」兩項理由，突破了過去清廷看待《四庫》的態度，帶來有別以往的思維。首先，《四庫》不再只是昔日清帝國的遺產，更代表了整個民族與古典文化的「國粹」；

¹⁵ 呂思勉，〈國民自立藝文館議〉，《東方雜誌》，卷22號7（1925年4月10日），頁87。

¹⁶ 〈本埠新聞·校印四庫全書之贊助〉，《申報》，1917年1月17日，第3張第11版；〈本埠新聞·徐東海宏獎風流〉，《申報》，1917年2月17日，第3張第11版。

¹⁷ 金梁，〈四庫全書纂修攷跋〉，《東方雜誌》，卷21號9（1924年5月10日），頁106。這份建議書後來收入《金氏舊稿》，藏在天津圖書館，未見，內容可參於李常慶，《四庫全書出版研究》，頁84。

¹⁸ 〈命令·十月九日大總統令〉，《申報》，1920年10月12日，第1張第3版。

也就是說，由朝代文化事業的光榮象徵，轉化為全民共享的歷史資源。其次，更有意義的是：代表「國粹」的《四庫》非惟具備文物之功能而已，現在還要透過出版工作，成為國家外交宣傳上的利器。

官方主動刊印《四庫》，當然吸引海內外人士的注意。具有書畫家、收藏家身分，也是交通系與政界要人的葉恭綽(1881-1968)，公開支持政府行動。葉氏在歐戰結束後不久，前往歐洲遊歷，適值西方「文化破產」的論調盛行，故他著意國際交流、宣揚中國文化。剛好法國的前總理班樂衛(Paul Painlevé, 1863-1933)亦心有戚戚，雙方一拍即合，決定在巴黎大學增設中國學術講座；¹⁹而葉恭綽歸國後則積極獻策，提議集資影印《四庫》，設立刊行會，並招商發行，以為外交所用。²⁰

在葉恭綽巧妙構思下，《四庫》結合商業出版和專家意見，開展生命新頁。他主張採用文淵閣本，並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承印。然而有兩項困難亟待克服，一是文淵閣本藏紫禁城內，產權隸屬清室；另一是出版商相當慎重考量市場和收益問題。1920年10月間，商務印書館的代表張元濟(1867-1959)北上，分別與葉恭綽、朱啓鈞、陶湘(1871-1940)等人商談。從張氏日記可知：館方基於利益，希望調高定價達到收支平衡，又不願一家承擔此力，與當局的意見扞格。²¹雙方既無共識，故無議決。

(二) 文化事業背後的國族認同與角力

商務印書館和官方意見相左，表面雖係商業考量，實際上還與政府的信用不彰有關。經由友人透露內幕，顧頡剛記載了其中軼事：

¹⁹ 俞誠之編，《葉遐庵先生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據1946年版影印，1970），頁74-76。班樂衛不久後來華，建議退還法國庚子賠款來影印《四庫全書》，得到徐世昌的支持。見賀培新輯，《水竹邨人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冊184，總頁218，民國八年條。班氏來華經過，另參陳三井，〈法國前總理班樂衛訪華之行的意義〉，收入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1），冊2，頁176-193。

²⁰ 葉恭綽，〈闡揚文化條陳〉，《遐庵彙稿》（上海：上海書店據1946年版影印，1990），上編「公牘」，頁87-88；又見葉恭綽，〈刊行四庫全書提案〉，《遐庵彙稿》，頁97

²¹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卷7，《日記》，頁231-235、242。

聞俞守紀云：去年班樂衛到京後，徐總統即欲重印《四庫全書》，招商務館經理張元濟到京，商是事。張氏恐其工料價延不清償，或以公債票作抵，反使館中受大損失，故託言中國紙張不足、辭去。商務館既不承印，中國遂無可以承印之書店。徐氏遂延日本商家為之。現在由彼國技師在京拍照，將照片寄回日本石印。此事由外國人承辦，則政府不敢欠矣。²²

顯見拒絕承印之由，與民初中央政府角色薄弱有關。有意思的是，出版《四庫》的文化事業也令外人覬覦。引文最後言及當局有意「延日本商家為之」、「由外國人承辦」，說明文物產權及其出版工作，成為各方爭奪資源的場域，無形中使得問題愈加複雜。

前述哈同打算校印《四庫》而受阻，同樣證實了外人的興趣；其實 1920 年代數次倡印《四庫》之聲浪裡，都可看到類似事件背後相互較勁的景況。譬如一位署名「濟滄」的人，公開發表言論，對象是擁有文淵閣本的清室。他認為民國後北京屢逢軍事政變，文物實難保全，因此呼籲速將文淵閣本流通，讓學者從事研究。這篇訴求的短文也提到：「教育部一國文化最高機關，當不至有所歧視也」，²³顯然站在共和政府的立場發聲。由於遜清皇室仍保有文淵閣本這一文物，難免造成許多無謂爭端。1922 年，又有傳言遜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不滿民國無履行「清室優待條件」，為了自籌婚禮經費，擬將奉天文淵閣本以一百二十萬元出售，並向駐京各國使館洽詢購買意願。此舉引來北京學界譁然，認為清室行為形同盜賣國家文物，要求教育部派員徹底清查「公共之產」，同時注意宮禁內《四庫》（文淵閣本）的動向。²⁴該項新聞雖屬捕風捉影，卻使日後王國維(1877-1927)建議文淵閣本連同內務府所藏古器、書畫

²² 顧頡剛，〈影印《四庫全書》事〉，《顧頡剛讀書筆記》，卷 1，頁 185。

²³ 濟滄，〈對於四庫全書印行之意見〉，《申報》，1920 年 11 月 15 日，第 3 張第 11 版。

²⁴ 〈國內要聞·清室密賣奉天四庫全書〉，《申報》，1922 年 3 月 28 日，第 2 張第 7 版；沈兼士等，〈為清室盜賣四庫全書敬告國人速起交涉啓〉，《北京大學日刊》，期 1005（1922 年 4 月），第 3 版。

應該要一起開放，俾供觀覽。²⁵

另一件紛爭更攸關國族認同問題，發生在 1923 年 8 月，由地方團體公開反對中央部會的「《四庫》押款事件」。肇始原因係陳寶泉(1874-1937)出任代理教育次長，卻苦於政府部員欠薪及罷工之擾，為求解決，謀思籌款之道。²⁶日本鉅商財團見機可乘，暗中派人磋商，願借款五十萬，以《四庫》為抵押。此消息歷經傳開，江庸(1878-1960)與地方教育團體公開反對。江蘇教育會的會員于定一(1875-1932)更以「飲鳩止渴」形容教育部舉措，建議政府應將《四庫》直接遷運上海慎藏，避免國寶落入外邦之手。²⁷整件事清楚反映了民眾視《四庫》為國家文物的心態；甚至還有人致函，言詞相當激動：

夫四庫全書者，為我國歷代文化之所寄、一國國粹之結晶品也。稍有人心者，必不肯以輕輕代價，斷送立國之國粹也。而長教育者，竟悍然為之，其尚有心肝否耶？若曰「文化革新」，舊集無所用度，不妨棄之，則試問三島東鄰，何愚魯至此，以鉅款收我廢物哉？想教次長當係學者，何不思之甚也。若不聽國民諫勸，一味孤行，以數千年文粹專書，輕押於外邦，則此事之損失，有百倍於清宮焚燬者矣。是不獨一千五百位校繕之人，心傷於九泉，陳氏祖先當亦不勝太息者也。而此罪大惡極之陳寶泉，當與全國人共棄之。²⁸

觀其語氣之強烈，當事人陳寶泉猶如千夫所指一般，成為舉國「罪犯」。此事最終乃以民意喧騰而未成。

即使是在政府部門中，支持和反對印行《四庫》的聲音，也以各自利益因素而形成對峙。1925 年 7 月，剛任教育總長的章士釗(1881-1973)，重啟官方

²⁵ 王國維，〈籌建皇室博物館摺〉，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卷 14，頁 217-218。

²⁶ 陳寶泉，〈五十自述〉，《退思齋詩文存》（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據 1933 年排印本，1970），頁 98。

²⁷ 〈國內要聞·陳寶泉有以四庫全書押款說〉，《申報》，1923 年 8 月 28 日，第 2 張第 7 版；〈本埠新聞·常州·函請保留四庫全書〉，《申報》，1923 年 8 月 31 日，第 3 張第 11 版。

²⁸ 〈本埠新聞·反對四庫全書押款之一函〉，《申報》，1923 年 9 月 2 日，第 4 張第 13 版。

主導出版《四庫》工作。他原先屬意的是文津閣本，但主管單位京師圖書館表示：館方素以收費方式接受外界鈔錄，且成爲每月收入來源之大宗，故多番阻撓。²⁹幾經折衝下，教育部改弦易轍，決定選印文淵閣本，主張「分爲三期付印，孤本既先，罕見之本次之」。³⁰爲了更加確立公信力，該部社會司司長高步瀛(1873-1940)先寫一份文字緣起，並請對《四庫》素有研究的陳垣(1880-1971)過目，希望獲陳氏背書。³¹整件事經國務會議確定後，要求文淵閣本送至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³²章士釗在此獲得充分授權，本來萬事就緒，惟仍事多乖舛。先是教育部中人員認爲影印庫書「乃大利所在」，不願出版商占盡便宜，因此「梗其議者多有」；³³繼而接管紫禁城故宮的「清室善後委員會」，以「宮內物件不得移出宮外爲原則，一致主張不使文淵閣書劃歸他處」；³⁴最後又因江蘇的盧永祥(1867-1933)與浙江的齊燮元(1879-1946)發生戰爭，造成鐵路交通中斷，教部中人忽爾翻議，加以商務印書館也來電自請中止，遂告絕望。親歷其事的章士釗日後追憶，不免深感苛責，頗以「中國文化之罪人者，則影印四庫全書不成是也」自言。³⁵

無論如何，以《四庫》爲名的文物之重刊工作，受制於國族認同及各方利益的明爭暗鬥，最後難產。在徐世昌主政時期，官方原想藉由出版《四庫》，進一步鼓吹舊學文化，溝通中外文明，增進國際之地位，可是出版商卻有不同考量，無意冒險承攬。同時基於國族認同，儘管外人有意介入該文物的出版事業，仍不免引來諸多爭議而止。另外，掌握此一文物產權的清室、教育部及京師圖書館，則各有盤算，既無意影印庫書，更不想讓出權益。

²⁹ 〈國內要聞二·文淵閣四庫全書開始檢查〉，《申報》，1925年9月24日，第2張第7版。

³⁰ 〈記載·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圖書館學季刊》，卷1期1（1926年3月），頁135。另見高步瀛，〈四庫全書選印目錄表〉，《東北叢刊》，期15（1931年3月），頁1-18。

³¹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頁373。

³² 〈記二十四日國務會議〉，《申報》，1925年9月27日，第2張第6版。

³³ 俞誠之編，《葉遐庵先生年譜》，頁161；孤桐，〈論影印四庫全書不成事〉，《國聞週報》，卷3期33（1926年8月29日），頁7。

³⁴ 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頁249。

³⁵ 孤桐，〈論影印四庫全書不成事〉，《國聞週報》，卷3期33，頁7。

爲了解決現況，有識之士莫不苦心殫慮，希望訴諸公眾，尋求改變。就在 1925 年 4 月，呂思勉公開撰文，倡籲人們擺脫既有窠臼，將《四庫》改造成爲全民共同的文化財產。他甚至在文中建議政府，應該設立「國民藝文館」，以《四庫》爲基礎出版「民國全書」。呂氏於結論這麼說：

顧今日猶有不知真相，一聞清室所藏之物、所為之事，即震炫，謂非吾儕所能夢想者，此則大非民國之民所宜有此心理者也。因近今商務印書館謀影印《四庫全書》，事被阻滯，國民頗有愴歎者，吾故作此篇，以廣國民之意。³⁶

這篇文章不獨將《四庫》放在文物國族化的範疇來看，更賦予《四庫》刊印事業提升民國國民知識的責任。接下來，我們還要繼續探索出版業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出版與認同：商務印書館對《四庫》印行的貢獻

（一）當文化理想遇上政治現實

位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是參與刊印《四庫》最重要之推手。它成立於 1897 年，對圖書市場發揮偌大作用，也引導近代中國思潮多元發展。論者認爲：商務印書館始終聲名不墜，實際上與其「文化理想」有關。³⁷質言之，堅持以「發揚固有文化，保存國粹」爲方針，³⁸注意古籍動態，是該館自開業來對現實及理想間努力折衷的目標。尤其負責編務的張元濟係浙江士紳，特別重視傳統文人和讀者群所需，加上家族又有藏書傳統，精於版本、目錄及校勘之學，自然不免關心罕見善本及成套的典籍。可是需要指出：清末時張元濟雖四處蒐購古籍，卻沒有影印出版的迫切感，直到民國建立後才改變想法。³⁹當中

³⁶ 呂思勉，〈國民自立藝文館議〉，《東方雜誌》，卷 22 號 7，頁 89。

³⁷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頁 119-171。

³⁸ 莊俞，〈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收入莊俞、賀聖鼎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附錄，《商務印書館三十五年紀念刊》，頁 21。

³⁹ 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頁 57。

因素實與出版市場日趨競爭有關，這在「五·四」期間出版《續古逸叢書》、輯印《四部叢刊初編》之前，便可看出端倪。

刊印文物《四庫》即為顯例。當時中華書局也積極投入出版古籍行列，⁴⁰迫使商務印書館不得不留意相關園地的開拓工作。譬如 1916 年，謠傳中華書局透過北京當局商借《四庫》，並慫恿哈同出資影印；政府要求以捐書一百部為條件，雙方並未達成協議。此舉引來張元濟注意。不久，商務印書館呈文至教育部，希望借《四庫》及影印其他各善本；甚至為求分擔出版費用，張元濟亦與哈同打交道，商討承印之事，且委託他人估算石印版費。⁴¹

1920 年代中國逐步邁向建設民族國家之際，出版業居於關鍵地位，商務印書館正係其中佼佼者。研究國族主義的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醒我們：現代出版事業之出現，對信息溝通的影響至深，非惟打破地理隔閡，促成人們「想像」一個共同體之存在，甚至還強化彼此的認同感。⁴²因為經由印刷資本主義提供「想像」的物質基礎，出版機構與圖書市場於是形塑了讀者群，甚至激發出一處「無形的」(invisible)公領域。⁴³在近代中國，新式媒體也帶動類似的現象，出版機構之角色居功厥偉。學者以「三家鼎立」描述商務印書館在民國時期出版的角色與貢獻；⁴⁴從前述徐世昌欲印文淵閣本，招攬張元濟共商其事，也能知曉一二。

⁴⁰ 錢炳寰編，《中華書局大事紀要：1912-1954》（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25-27。

⁴¹ 俱見張元濟，《張元濟全集》，卷 6，《日記》，頁 139-140、158、160-161。

⁴²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pp. 39, 44-46.

⁴³ 像是印刷技術的普及，對近代西方文明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因素，特別關於新興圖書市場及出版機構，有學者便認為這些係民主政治的動力來源之一。當然，伴隨文化事業發展的日新月異，出版商更為了因應各類出版品（如：參考用書、指南、百科全書、報紙、期刊等）需求，更進一步改變讀者對公共事務的習慣和「想像」（如出現預約制、著作權、編輯校對人員等新「機制」）。上述均見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pp. 1-26;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p. 149-176.

⁴⁴ 另外兩家為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商務印書館對當時民國文化界與政治的關係，見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pp. 212-225.

1924年，商務印書館開業將屆三十年，爲了舉辦慶祝活動，動議影印《四庫》以爲紀念。這件事由出版商主動推行，令人注目；而商務印書館願意獨力斥資，乃係考量下列兩項理由後的決定。首先，爲了平衡經費，館方另闢蹊徑，並非以原來比例出版，改採洋裝、縮小影印等權宜辦法。此一目的爲了要節省紙張，即張元濟所謂的「商家辦法與政府不同」。⁴⁵其次，商務印書館得以運用長期累積的人脈和社會網絡，分別向北京的清室內務府和民國國務院進行協商。經由前者慨允，借出文淵閣本，裝運至上海照相和印製；後者則是聲請由交通部鐵路局負責保護，同時辦理租用專車事宜。

但是，文化理想一旦碰觸到現實政治，整個工作更形複雜，外來阻力亟難克服。原先對內務府的聯繫，乃由身兼商務印書館的董事鄭孝胥(1860-1938)居中協調。鄭氏在民國後的身分相當特殊，他忠於清室，此時預備動身前往紫禁城內的「小朝廷」，擔任內務府大臣一職。鄭氏鑑於商務印書館的財力有限，有意援引日本對華文化事業中的庚子賠款，故向日方學界人士努力鼓吹；另一方面，又積極向其他滿清遺民說明，希冀獲取支持，他認爲出版《四庫》「此舉宜由皇室發起」。⁴⁶因此，效忠清室的遺民與共和政府之間印行理念不同，其中的角力及「鬥爭」在所難免。最初過程尚稱順利，後來北京當局不願清室博得美名，出爾反爾，遂讓商務印書館的議案胎死腹中。先是傳出總統曹錕(1862-1938)有意仿效徐世昌，由政府自印，接著國會議員李燮陽(1883-?)等人提出質問書，最後以曹氏親信李彥青(1886-1924)出面索賄六萬元而告終。⁴⁷

這次印行《四庫》受阻，很明顯來自政治因素的干擾。從張元濟給國務總理孫寶琦(1867-1931)的兩封信裡，可以略窺其中情形。簡言之，北京當局以利益考量，對文物的出版深感不安，故以「愛護古籍，格外慎重起見」爲由，「查禁裝運」。而張氏信中提出三點辯護：第一，影印《四庫》由於設備因素，有

⁴⁵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卷3，《書信》，頁322。

⁴⁶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總頁1974、1978。

⁴⁷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總頁1978-1979、1985、1986-1988、1993-1995。相關說明亦可見李大鳴，〈鄭孝胥與《四庫全書》的影印〉，《紫禁城》，2008年第9期，頁218-228。

必要裝運至上海；第二，如果留在北京付梓，則花費將更多，效果不彰；第三，反駁外傳商務印書館以刊印典籍為名，行變賣文物之實的謠言，直呼「此真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⁴⁸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點關於謠言部份，說商務印書館「誑取此書，轉售異域」，並非空穴來風。揆其始末，乃因該館透過鄭孝胥，獲得內務府支應，遭人怨妒。由此推知，《四庫》出版之議，使得原來政治立場不一的民國政府與清室，深化彼此對立及緊張氣氛。難怪日後紫禁城內「小朝廷」政爭日益白熱化之際，王國維親自上疏彈劾鄭孝胥，文中謂其為禍首。王氏說，清帝輕率地將《四庫》商借他人，又把全書運滬，不免遭致社會輿論的疑慮，本來「出於獎勵學術之盛心」，萬一發生差池，售予外人，深怕「民國若以此為辭，而盡沒收宮中之物，……我皇室亦無辭以責民國，臣民亦無辭以助我矣」。⁴⁹王國維直接點明出版《四庫》工作牽涉的國族認同和政治性問題，不言可喻。

在這次爭執中，商務印書館居於下風，既得不到統治當局的支持，還被冠上「變賣古物」之嫌。可是對張元濟來說，刊印《四庫》仍為個人使命，形容自己的努力猶如歷史上「三藏取經」之舉。⁵⁰直到整件事情徹底宣告失敗後，張氏仍不死心，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必達此願」，而館中同仁也深懷類似想法。⁵¹

（二）出版龍頭的優勢

嚴格說來，商務印書館符合《四庫》出版的條件。先就專業因素來看，除了前述顧頡剛所言「商務館既不承印，中國遂無可以承印之書店」可資佐證之外，該館具有豐沛的人脈資源，得以諮詢相關領域的專家，實是其他業者難以望其項背的優勢。以刊印《四庫》來說，屢屢借重史家陳垣的專業學能，即為

⁴⁸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卷3，《書信》，頁519-521。

⁴⁹ 王國維，《劾大臣不明事理疏》，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14，頁222-223。

⁵⁰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卷3，《書信》，頁324-325。

⁵¹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總頁2141。

顯例。⁵²

此外，當時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圖書館運動」，⁵³出版業者爲了因應各處新設圖書機構館藏圖書之需，莫不卯足全勁，發行各類書籍，競爭激烈。針對此，商務印書館看準潮流風氣，積極配合，故印行《四庫》既能訴諸文化理念，又可兼顧商業利益。後來 1930 年代時，輿論曾質疑該館致力介入《四庫》出版工作，目的是爲了牟利。甚至有人形容：「政府辦文化事業，既不撥付鉅款，乃向商人方面索取小利，改〔致〕使全國讀書之人受其害，實大不應爲者也」，⁵⁴反映當中政治及商業考量。

從外在條件而言，商務印書館主張出版《四庫》，實際上也呼應了時代氛圍。受到風潮影響，其他地區亦有類似倡議影印《四庫》的文化活動，該館只是鮮明之例而已。例如，東北在 1920 年代有規劃出版文溯閣本，同時展現出地方認同之意涵。民國肇建不久，北京政府便將文溯閣本運京保存，與文淵、文津鼎足而三。直到 1925 年，因爲奉天地方意識抬頭，當地教育人士擬辦圖書館和博物館，呈請索回。⁵⁵1928 年秋天，張學良(1901-2001)以「發揚國光、

⁵² 像李宣龔(1876-1953)曾致函陳氏，說道：「敝館承印《四庫全書》事，屢承指導，銘感不諼。且文津閣一書，原爲我公平日所整理者，一切簡帙，秩然有序，尤堪徵信。月前曾代夢翁面約，俟全書運滬之後，擬請執事蒞滬一游，共商綿槩。辱蒙允許，此不獨敝館之榮幸，異日書成，揭糈得當，必更有以饜海內人士之望者，則皆我公之賜也。」見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 269。

⁵³ 李澤彰，〈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出版業〉，收入莊俞、賀聖鼐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卷下，頁 267-268。「圖書館運動」展開於 1925 年，主旨有二：一爲保存文化，一爲建設文化。當時「中華教育改進社」擬將美國方面庚子賠款的三分之一用來建設圖書館八所，並分布於中國各要地，主要推廣人是沈祖榮(1884-1977)、鮑士偉(Arthur E. Bostwick, 1860-1942)和美國圖書館家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 1862-1931)女士。韋棣華在美便積極推動退還庚子賠款，並建議以一部份用於建設和擴充圖書館。直到 1928 年「全國教育會議」召開，大會通過請全國各校均需設置圖書館，於是運動瀰漫全國。見李文綺編，《北平學術機關指南》（北平：北平圖書館協會，1933），頁 18；Priscilla C. Yu and Donald G. Davis, Jr., "Arthur E. Bostwick and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A Chapter in International," *Libraries & Culture* 33:4 (Fall 1998), pp. 389-406.

⁵⁴ 李益華，〈爲影印四庫全書事敬告當局〉，《北平晨報》，1933 年 8 月 14 日，第 12 版。

⁵⁵ 由奉系首領楊宇霆(1886-1929)致電教育總長章士釗，要求點交返奉，兩年後則以「增進文化起見」，開放閱覽。據繆鳳林(1898-1959)給陳垣的信中指稱，省當局撥款十萬修葺文溯閣，並有部份人士倡議將紫禁城內三殿之古物提歸。俱見李符桐，〈文溯閣的今昔〉，收入東北文物展覽會編，《東北文物展覽會集刊》（瀋陽：編者印行，1947），頁 54；〈圖書館界·文溯閣四

傳播文化」為由，決議影印文溯閣本，並打算大購遺書，廣招名宿進行續修事業。張氏此舉沸沸揚揚，非但引起社會輿論譁然，更觸發了中央與地方間的緊張情勢。據報刊所載，最初擬印五百部，每部約有二百三十萬頁，預計三年內印成，⁵⁶沒想到此一消息披露後，立刻引來各方關切。像《申報》有位筆名「乘黃」的作者，聲稱「南方鴻博之士，亦應有所商兌，勿令專美於前」；而南京國民政府文官處則通電指出，現正籌印此書，請勿複印。嗣後可能在若干壓力下，終未印出。⁵⁷

再者，私人主張選印《四庫》的呼聲也此起彼落，如德國某富商欲以遺產發展中國文化，遂想摹鈔《四庫》一部，展開選印計畫，⁵⁸後來無疾而終。金梁也在東北擬印文溯閣本的同時，以「工程浩大、徒耗物力」為由，建議選印孤本，並倡續修事業。當樣本一出，海內外紛紛函電訂購，結果又以他故而中阻，最終僅成續修總目（由倫明輯一萬餘種）及選印要目（由熊亦元擬二百餘種）。⁵⁹直到 1930 年秋天，金梁才選出首要書二百四十一種，以未見刊本或絕版者為限。另外，版本目錄學家陳乃乾亦有意選印。1931 年 2 月，陳氏與上海的友朋考慮商務印書館之辦法不切實際，因「全書繁重，若整部照印，則違論棉薄有所弗勝，且其中通行之本，所在多有，亦不能不加以別裁，取精用弘」，故將《四庫》著錄中流通不廣、稀見的傳本列目如後，徵求同好提出取舍意見。那時陳乃乾的初步計畫是：「一俟商略大定，即當分期印行」。⁶⁰

庫全書開放》，《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卷 3 期 2（1927 年 10 月），頁 11；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 227。

56 亦強，〈影印四庫全書之難題〉，《北洋畫報》，期 325（1929 年 5 月 30 日），頁 3；〈遼寧印四庫全書每部二百三十萬頁定三年內可以印成〉，《中央日報》，1929 年 3 月 15 日，第 3 張第 2 版。

57 俱見乘黃，〈聞奉方開印「四庫全書」之聯想〉，《申報》，1929 年 1 月 14 日，第 5 張第 19 版；董眾，〈選印文溯閣四庫全書議〉，《東北叢刊》，期 6（1930 年 6 月），頁 1-12；倫明，〈擬印四庫全書之管見〉，《國聞週報》，卷 10 期 35（1933 年 9 月），頁 1-2。

58 高夢旦，〈校印四庫全書及其他舊書計畫〉，《東方雜誌》，卷 30 號 19（1933 年 10 月），頁 97-98。

59 〈閣本與版權爭執中金梁對選印庫書意見〉，《時事新報》，1933 年 8 月 30 日，第 2 張第 4 版。

60 陳乃乾，〈擬印四庫全書簡編目錄序〉，《民國日報》，1931 年 2 月 16 日，第 2 張第 4 版。

至於商務印書館本身，受到戰火波及，出版事業陷入危機，惟始終未曾放棄刊印《四庫》之理念。1932年1月28日，日本陸戰隊侵犯上海市閘北區，出動飛機進行轟炸，造成人員傷亡，商務印書館總廠亦受殃及。數日後，該館自1926年建立和珍藏典籍的「東方圖書館」又慘遭焚燬，所藏書籍與文稿盡化劫灰。這一舉世震驚的轟炸事件，激起海內外人士共同撻伐，促使中國學界和政界高度關注。⁶¹嗣後為求生存，商務印書館積極開拓一系列的「編輯叢書」計畫，包括編印中小學教科書、大學叢書、小學生文庫、萬有文庫等，更打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口號，以期發展進一步的商機。⁶²這些努力對影印《四庫》工作之順利進展也有所助益。當1933年南京國府有意尋求合作伙伴時，商務印書館便成為不二人選。親自主事的蔣復璁(1898-1990)呈文教育部曰：

該館印行之四部叢刊，曾有多種，乃影印《四庫》底本，字畫清楚，樣式合宜，卓有經驗。上年該館雖遭亂受損，但機器資力及復興之猛，猶為國內各事業之冠，故復璁特往上海與該館多次接洽。⁶³

雖為無心插柳之舉，可是商務印書館早已萬事俱備，蓄勢待發了。

三、「書」與「本」之辯：環繞在影印《四庫》的爭議

1933年發議刊印《四庫》，來自以下幾項契機：首先是上述戰前出版業的危機與轉機，商務印書館強化了本身的條件。其次，官方積極推動政治「中央化」，機關建置配合政策的需求，進一步促使《四庫》之出版。最後受到日本侵華之壓力，輿論在民族精神昂揚與共赴「國難」下，讓文物保存及其公開獲得落實。

⁶¹ 何炳松，〈商務印書館被燬紀略〉，《東方雜誌》，卷29號4（1932年10月16日），頁3-10。蔡元培(1868-1940)、孫科(1891-1973)等人均公開撰文，譴責日軍暴行。

⁶² 有關這段期間商務印書館的簡述，請見溫楨文，《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1932-1945)》（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頁19-32。

⁶³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433。

（一）新文化機關的建置

隨著 1928 年南京國府「北伐」成功，中國獲得名義上的統一，政府影響力伸展至每一角落，各項社會、經濟、文化政令逐步配合「中央化」原則，成為國家建設一環，出版《四庫》也是具體之事例。然而應該指出，這次刊印工作固由官方倡導，卻得力於新的文化機關——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央圖」）——之建置。

央圖乃利用英國退還庚子賠款資金，由教育部委派蔣復璁負責籌備，⁶⁴於 1933 年 4 月建成，宗旨「在為新都供給一研究學術之圖」。⁶⁵它是中國第一所國家圖書館，在此之前，中國的圖書機構大抵分布於城市，特別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北京、南京，以及各地方的政府機關、學校之圖書館，但這些圖書機構均非由南京國府籌建。

實際上，央圖之建立乃配合當時國民政府的文化及出版方針。為了維持「黨治」政策，1930 年國府明令各書刊的出版必須配合審核要求，否則對業者施行查禁。出版名人張靜廬(1898-1969)回憶那年秋天創辦的上海聯合書店，遭逢政府控管，「一次就查禁十七種，變成爲好銷的書沒有了，剩下來的都是不能銷出去冷門貨」。⁶⁶類似像張氏那樣經歷的人恐非少數。同樣地，央圖也被納爲國府掌控輿論和統一口徑的機關，當時出版法規規定：每一項出版品必須呈

⁶⁴ 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台北：國立編譯館，1961，台一版），頁 278。蔣復璁，浙江海寧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是中國近代軍事理論家蔣方震(1882-1938)之侄。1923 年時，他在北京參與梁啟超主持之松坡圖書館工作，嗣後擔任過多項圖書館界的組織和職務，並於 1930 年赴往德國進修，任普魯士邦立圖書館客座館員，深受歐美圖書館學的影響。1933 年蔣氏歸國後，初任國立編譯館編譯，後因與朱家驊相善，故朱任教育部長，所以蔣爲央圖籌備處主任。晚年蔣自言，舉凡親身經歷，「可以說是中國圖書館用美國方法的經歷」。俱見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46-47；朱傑，《天風海濤樓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68；蔣復璁，《中美合作下的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珍帚齋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 2 下，頁 576。

⁶⁵ 沈祖榮，〈中國圖及圖教育調查報告〉，《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卷 9 期 2（1933 年 10 月），頁 6。

⁶⁶ 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上海書店據上海雜誌公司 1938 年版影印，1990），頁 139。

繳央圖，「經教育部核收後，發交教育部圖書館、中央教育館、中央圖書館各一份，分別保存」，以利歸檔管理，否則禁止發行。⁶⁷

由於央圖正處於籌備階段，爲了因應藏書不豐的窘況，蔣復璁多方謀求解決辦法。他接任央圖工作後不久，即奉教育部之命前往北平，協調將清朝學部及北洋政府時期舊教育部的檔案、書籍等運回南京。這趟北方之行所獲得的圖書，委交央圖保管，以充實館藏。⁶⁸除此之外，蔣氏私下向胡適(1891-1962)請益有關發展館藏圖書的辦法，胡則勸其以蒐集「新古董」爲方針。所謂的「新古董」，「即收集政府機構出版的各種公報及官文書」，⁶⁹成爲央圖的館藏特色。此一意見後來不僅被蔣氏採納，還進而落實到國際交換圖書的業務上。⁷⁰此前國民政府與各國圖書館進行出版品交換的工作時，係由中央研究院統籌辦理，現則歸給央圖負責。爲了讓交換圖書的業務能夠更加順暢，甚至有所憑藉，蔣復璁向教育部長朱家驊(1893-1963)提出建議，希望以出版文淵閣本做爲交換品。朱氏覺得此一辦法可行，因此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通過決議。⁷¹

教育部和央圖以配合新機關的需求爲前提，決定刊印《四庫》，相當吸引國內外媒體關注。《泰晤士報》(*Times*)曾經爲此進行報導；在中國，有人還目爲「文化史上一大成功」。⁷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不少反對的聲音。具體來說，此次印行過程的主旋律，不在「可否」出版的能力上，而是在「應否」

⁶⁷ 〈新出圖書呈繳規程〉，收入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合肥：黃山書社，1999），冊59，頁392。關於國民黨查禁和審查辦法的決議，參見〈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中央宣傳委員會工作報告（節錄）〉，收入王煦華、朱一冰合輯，《1927-1949年禁書（刊）史料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冊2，頁46-69。

⁶⁸ 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頁51。

⁶⁹ 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頁51。

⁷⁰ 這是蔣復璁親自向張鼎鍾(1934-)提及。見Margaret Chang Fung, *The Evolving Social Mission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China 1928-1966*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94), p. 59.

⁷¹ 〈教部呈請行政院印行四庫全書爲節省經費先印八九百種以資流通而免失傳〉，《中央日報》，1933年4月22日，第2張第3版；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頁52-54。

⁷² L. Carrington Goodrich, "China's Greatest Book: (The Ssu K'u Ch'uan Shu)," *Pacific Affairs* 7:1 (March 1934), p. 62；劉迺敬，〈文化史上一偉大工作——影印四庫全書〉，《時事月報》，卷9期2（1933年8月），頁80。

出版的爭議上。至於爭論之所以產生，主要來自累積知識的機構——圖書館之中，並且集中在兩處擁有資訊的核心城市：北平和南京。

（二）《四庫》印行引發知識界爭論

1933年5月至11月間，《四庫》的印行舉措引發南北學人議論，紛紛在雜誌、報刊上投稿陳書。這場被形容為「風雨滿城」的筆戰，⁷³緣自甫任教育部長的王世杰(1891-1981)特命蔣復璁赴上海與商務印書館訂立合同。嗣後，由董康(1867-1947)、傅增湘(1872-1950)、葉恭綽等文化界人士公開聯名致書教育部，呼籲政府應延聘通儒，從長計議。他們的共識是：《四庫》書目中若干的宋元著述，皆有同光後的單刊本或叢書本，在現存的圖書資源條件上並非難求，因此不該貿然決定出版。

若以事後發展來看，董康等多位文化名人並未意識到他們出面連署將演變為一場大風波。⁷⁴結果北平當地多位學者隨之撰文，倡籲政府影印《四庫》時應先考慮將文淵、文津閣本進行比勘，凡有舊刻本可供替代者，當廢庫本別採他本為宜。至於支持教育部和央圖辦法的，多為南京方面學者，雙方為此展開論爭。許多報刊都刊載有關影印《四庫》問題的專號，熱鬧地不可開交。某刊物甚至說「執筆者大較皆知名之士，異日版行定能飽藝林之眼福耳」。⁷⁵

論戰中來自反對意見一方的群體，均任職於北平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圖」），袁同禮(1895-1965)即為當中領袖。此處有必要稍稍交代一下北圖的來

⁷³ 謝國楨，〈評「再論名流與景印四庫珍本」〉，《時代公論》，卷2期29（1933年12月），頁16。

⁷⁴ 尤其葉恭綽在北洋政府時期多次力表支持刊印《四庫》，何以此次站在反對立場？或許我們可以從私人書信裡窺見一二。據董康向張元濟言，此事最初係趙萬里持一信來，請董氏簽名；後來張氏「告以個中曲折，授經乃恍然」。顧頡剛日記則說到：「在報端見董康領銜以上教育部論《四庫全書》事列有予名。事前未商同意。」由董、顧兩人之例，可以想見具名連署致書教育部，可能當事者並不見得完全瞭解其中原委，但卻貿然列名。事詳：張元濟，《張元濟全集》，卷3，《書信》，頁395-397；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卷3，頁78，1933年8月15日條。

⁷⁵ 計有來自南京鍾山書店出版的《國風半月刊》，以及最初發難者《北平圖書館館刊》、《北平晨報》等。見〈圖書文化消息·關於影印四庫全書之專號雜誌〉，《浙江圖書館館刊》，卷2期5（1933年10月），頁25。

歷。該館地處人文薈萃的故都，原為京師圖書館和北平北海圖書館所合併。前者承繼清朝學部，富於圖書典藏；後者則由英國庚款補助成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在 1925 年時獨立開辦，擁有充沛的經費資源。⁷⁶以方志為例，北海圖書館自 1926 年開辦後，陸續購入五百部，多為京師圖書館未備。直到 1929 年 9 月兩館合併，又得所購所贈的方志千數百部，計凡五千二百餘部，⁷⁷早為中外各圖書機構注目。再者，北圖不僅是一處專門進行採購、編目、收藏、借閱圖書的地方，同時亦為一學術研究單位。除了各部的主任、館員之外，館中還設有專門的編纂委員，從事圖書整理。⁷⁸因此，該館集合了一批對中國典籍最有研究的學者，且學術業績卓然有成。他們大多具現代目錄學和史學專長，運用新式圖書管理學之方法，處理文獻史料，頗受海內外學界重視。⁷⁹

北圖在政府決議刊印《四庫》之際，公然反對。袁同禮與向達(1901-1966)率先聯名發表〈選印四庫全書平議〉一文，分別登於《大公報》和《國風半月刊》上，提出兩點「訾議」：第一，央圖與商務印書館的影印合同中有若干瑕疵，如雙方締約後，版權永歸央圖所有，而原來負責保管、提供文淵閣本的故宮博物院，卻無任何置喙之地。袁氏等人認為整件事形同架空了故宮院方，不讓其參與，「未能盡合事理，致釀反感」。⁸⁰第二對教育部擬定籌印的辦法及標準，大感可議。簡單地說，袁同禮等學者力持要「以善本代庫本」，理由是：

比年以來，古籍發現，日增月益，四庫館臣未見之孤本秘笈，今則巍然尚存天壤，故同人所主張之采用底本，國內外學人，無不贊同。⁸¹

袁認為中國近年來古籍的發現已非十八世紀可比擬，所以他在另一封信裡，逕

⁷⁶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國立北平圖書館概況》（北平：編者印行，1929），頁 4；楊翠華，《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82、96-98。

⁷⁷ 袁同禮，〈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序〉，《圖書館學季刊》，卷 7 期 2（1933 年 6 月），總頁 339-340。

⁷⁸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驥前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56。

⁷⁹ 費正清，〈我所認識的袁守和先生〉，收入袁守和先生紀念冊編委會編，《思憶錄：袁守和先生紀念冊》（台北：編者印行，1967），頁 13。

⁸⁰ 袁同禮、向達，〈選印四庫全書平議〉，《國風半月刊》，卷 3 期 4（1933 年 8 月），頁 10。

⁸¹ 袁同禮、向達，〈選印四庫全書平議〉，《國風半月刊》，卷 3 期 4，頁 11。

稱「善本難致」的問題，似已無庸過慮。⁸²對此「采用古本，廢除庫本」之講法，當然造成學術知識界的震盪，迫使教育部不得不有所回應。教育部長王世杰馬上辯駁，說「版本追究無窮，採訪尤費時日」，⁸³如果一味只是相信善本的重要，恐會錯失出版時機；袁則言「文化事業，似不應因事實上之困難，而拋棄學術上之主張」。⁸⁴

這場刊印《四庫》的爭論，無論支持或反對立場，均各執一詞，據之成理。用錢基博(1887-1957)的話，教部和北圖產生歧見，乃於「書」與「本」之認知不同。前者意在重視書冊本身而不在版本，擔心戰禍來臨，會讓「古籍寢以散失」；後者則斷斷於那些未刊善本或罕傳本，害怕「未刊終於不刊」。⁸⁵兩造爭執關鍵是：在戰火隨時可能波及的情況中，究竟要保存文獻、使之倉促出版？還是基於重視學術真理的原則，直迨善本蒐羅完備後才付梓面世？

不過，如果進一步推究，學術認知的歧異或許只是表象，因為反對者頗有「爭勝」之意味。尤其當教育部推展文化和出版工作的同時，北圖和央圖正進行著一場圖書資源的爭奪戰。袁同禮致張元濟的信函中，聲明「同人不敢，瀟願勉盡棉薄，共襄盛舉，以期能底於成，不致再蹈前人之失」，⁸⁶一語道破當中「互別苗頭」的心曲。曾經與蔣復璁一起留學德國的朱偁(1907-1968)，說蔣氏為人「好講典故，滔滔不絕，但所述都不經，儕輩亦姑妄聽之」，又言：

蔣為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思一鳴驚人，影印《四庫全書》真本，以與北平圖書館分庭抗禮。北平圖書館長袁同禮氏，以圖書館權威自居，心弗善也，鳩集北京學者反對之，並在報刊撰文論影印《四庫全書》之非計，於是二人積不相能矣。⁸⁷

另據蔣氏晚年憶述，最先構思籌印《四庫》之際，他曾告知趙萬里(1905-1980)。

⁸² 〈影印四庫全書 袁同禮張元濟各述立場〉，《北平晨報》，1933年8月18日，第7版。

⁸³ 〈教育部部長復蔡袁二君函〉，《大公報》，1933年8月14日，第3張第11版。

⁸⁴ 袁同禮、向達，〈選印四庫全書平議〉，頁11。

⁸⁵ 錢基博，〈選印四庫全書平議〉，《青鶴》，卷1期22（1933年10月），頁325-327。

⁸⁶ 〈影印四庫全書 袁同禮張元濟各述立場〉，《北平晨報》，1933年8月18日，第7版。

⁸⁷ 朱偁，《天風海濤樓札記》，頁168。

當時趙氏建議勿洩此事於袁同禮，因為「袁先生做事很快，你告訴他此事，你還沒回南京他事情就辦好了」。等到蔣氏向商務印書館交涉事畢，消息登載報上，雙方心結由此而生。⁸⁸不難想見彼此對立之情形。

袁、蔣兩人爭鋒相對，不特私人情誼受到影響，更擴大到北圖和央圖兩個機構。未幾，劉節(1901-1977)、譚其驥(1911-1992)及王重民(1903-1975)等人，更在《北平晨報》、《大公報》上撰文，傳達主張。這三位學者均任職北圖，自然站在「以善本代庫本」的立場，深覺刊印「已完全進入純粹學術範圍」，應該要「以事實為前提」，⁸⁹不表苟同。

(三) 中央與地方的爭持

「爭勝」之外一章，則是中央與地方文化勢力間的競爭。此處「地方」指的是平津一帶的知識界，而「中央」係以南京地區的文化人士為主。南京方面人士態度大抵支持政府；此次為政府接連出面發言的，是擔任監察院監察委員的田炯錦(1899-1977)，在《時代公論》上發表文章。《時代公論》於南京出刊，在 1930 年代普遍被視為具有半官方色彩，當中作者多為中央大學執教的學人，其政論意見與政府同調。⁹⁰田氏之文可謂替國府發聲反擊。

在不具名的〈名流與景印四庫珍本〉中，田炯錦戲稱那些高唱反對之「名流」，飽受「文人相輕」遺毒，因此產生「意氣之爭」，所言盡是「徒求理想而不求實行」，形如教育界的「學閥」。⁹¹從通篇文字看來，田氏的焦點並不在學術上，而是凸顯人事紛爭問題。由於討論的內容並非《四庫》本身，難怪

⁸⁸ 蔣復璁晚年認為根本就是袁同禮從中作梗。他說：「袁同禮看到後十分不高興，因為他也要出這個風頭，覺得讓我辦成此事很沒面子，乃在北平找了許多人來反對此事，使我騎虎難下，而南方中央大學的一批人就幫助我，結果南北雙方打起筆墨官司。」俱見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頁 52-54。

⁸⁹ 均見劉節，〈四庫本之評價〉，《北平晨報》，1933 年 8 月 15 日，第 12 版；譚其驥，〈由乾隆論旨證四庫本之不盡可靠〉，《北平晨報》，1933 年 8 月 15 日，第 12 版；王重民，〈論教育部選印四庫全書〉，《大公報》，1933 年 8 月 14 日，第 3 張第 11 版。

⁹⁰ 許小青，《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1919-19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 297-314。

⁹¹ 錦，〈時論述評·名流與景印四庫珍本〉，《時代公論》，卷 2 期 23（1933 年 8 月），頁 3-5。

袁同禮立即回信，抨擊田文「多屬感情語，於事實相距甚遠」。⁹²接著田發表議論，謂袁之所以出言，其實是「意存阻撓」和「吹毛求疵」，並說：

以常理論，有一個不善本的書流行，總比沒有強；許多經書子書，在漢朝求古書時，固然有人作假的以充篇幅，但因為有這些不善本，而後人始能從其中考證古書真面目。若當時有個袁先生，抱甯缺勿濫之宗旨，不許流行，則後人根本不能見書，又焉從考證真假？⁹³

田炯錦斥責袁氏等「名流」們，素來對政府措施的把關格外嚴苛，尤喜批評那些「有價值」的事。而且行文裡，又以不列名方式，暗諷胡適為例：

十五年前有人作了一本較有價值之上古哲學史，被一幫通儒們吹毛求疵的批評。而其前後所出關於哲學的著作，無論怎樣亂七八糟，卻無人加以指摘。批評者或屬善意的求全責備，但作者卻因怕人批評，將中古及近代，不敢輕易付印。而有心研究哲學者，遂失了一種很有價值的指南。

他認為「此次景印四庫珍本亦是這樣」，所以擔心黨同伐異的結果，學界恐怕要跟政界一樣，彼此傾軋，只會造成落後與破壞，毫無建樹。⁹⁴

於此我們大致可以嗅出：北方學者對政府作為基本上皆採抵制態度，南方學者則幾乎千篇一律站在聲援官方的立場。⁹⁵蔣復璁後來甚至說到「袁之所以

⁹² 〈袁同禮致時代公論記者書〉，《國風半月刊》，卷3期6（1933年9月），頁19。

⁹³ 田炯錦，〈再論名流與景印四庫珍本〉，《時代公論》，卷2期26（1933年10月），頁10。

⁹⁴ 引文俱見田炯錦，〈再論名流與景印四庫珍本〉，《時代公論》，卷2期26，頁13。

⁹⁵ 譬如：孫楷第(1898-1989)、陳瀛一(1892-1953)位居北方，提出多項質疑，而任職於國立編譯館的鄭鶴聲、藏書家葉德輝之姪葉啓勳(1900-1972)、浙江圖書館館長張宗祥，以及葉仲經、徐澄宇等，皆以「文獻徵存」為由，支持刊印文淵閣本，盼其速成。詳見孫楷第，〈論教育部選印四庫全書〉，《北平晨報》，1933年8月22日，第12版；傅振倫，〈站在學術的立場來論影印四庫全書〉，《北平晨報》，1933年9月4日，第12版；鄭鶴聲，〈對於影印四庫全書輿論之評議〉，《國風半月刊》，卷3期6（1933年9月），頁37；葉啓勳，〈論選印四庫全書〉，《金陵學報》，卷3期2（1933年11月），頁634；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70；葉仲經，〈清四庫全書平議〉，《金陵學報》，卷3期2（1933年11月），頁627-631；徐英，〈致教育部長論景印四庫全書珍本事〉，收入陳家慶編，《徐澄宇論著第一集》（上海：華通書局，1933），頁106。

失敗實由於他反對教育部」，⁹⁶從中亦可知曉南、北專家相互傾軋的內在因素。除了意見爭持外，雙方也各有利益盤算。對北方知識界而言，政府從故宮運載文淵閣本至南方，無疑剝奪了他們藉由維護文物以「保全華北」的用意；⁹⁷至於對南方來說，北方學界不支持政府決策，既非符合利益所求，也悖離了國家「中央化」原則。

田炯錦連續撰稿抨擊，終於引來他人回應。一位不願具名的作者「聖羽」，在當時監督南京國府最烈的《獨立評論》上撰文譏諷田氏。他說田文「通篇語氣只覺得官氣逼人，活像一位政府發言人的口吻」，充滿「政治的氣味」。又說：「此事只不過選印幾部破爛古書，絲毫牽不到政治，所以有幾位書呆子們才會搖筆為文，各効芹獻，萬想不到田先生會加以『苛責』政府的罪名。」⁹⁸另一筆名「君羽」也對鄭鶴聲(1901-1989)的文章深表質疑，謂鄭氏供職國立編譯館，屬於政府機構，其實爲了替官方打圓場而寫文章；當中特別還講到「歎惜大公報記者心理之卑弱及指摘平館，別有企圖」，到處充斥不滿的聲音。⁹⁹

此次爭論儘管曲折，最後仍決定刊印《四庫》。教育部爲了平衡反對的意見，決定採取「兩全」的權宜辦法。先以官方名義召集組織委員會，並完成《四庫》孤本叢刊之擬目，在面對全部影印的輿論質疑及社會壓力下，最後決定選擇性出版「珍本」。¹⁰⁰至於高呼反對立場的北平圖書館，堅持以「善本代替庫本」，獲得教部同意影印《四庫》善本叢刊，並與商務印書館訂約。因此，時

⁹⁶ 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頁 54。

⁹⁷ 就在同一時間，日本意圖謀取華北，而北方學人對政治南遷後北平的危境感到憂心忡忡。就像胡適說：「北平學術研究上的地位則不但影響全中國，並且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與承認。如果我們讓北平淪陷於敵人之手，如果我們坐視這個文化中心的摧毀，那麼，將來整個北方文化事業恐怕只有全盤讓給日本外務省的東方文化事業部來包辦了！」見胡適，〈保全華北的重要〉，《獨立評論》，號 52·53 合冊（1933 年 6 月 4 日），頁 4。

⁹⁸ 聖羽，〈旁觀者言〉，《獨立評論》，號 73（1933 年 10 月 22 日），頁 17。

⁹⁹ 君羽，〈鄭鶴聲先生「對於影印四庫全書輿論之評議」的讀後感〉，《獨立評論》，號 75（1933 年 11 月 5 日），頁 18-19。

¹⁰⁰ 儘管在此過程裡，仍有人對於「珍本」的選目頗感質疑，認爲是「藏書家之選擇」，但最後還是得到多方共識。計有經部 61 種、史部 19 種、子部 34 種、集部 117 種。詳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卷 7 號 5（1933 年 9 月），頁 111-122。質疑的聲音可見王和，〈談談所謂「四庫珍本」的選目〉，《申報》，1933 年 7 月 19 日，第 5 張第 17 版。

論有言：「斯可謂景印《四庫》珍本之副產品也。」¹⁰¹

這場歷經折衷及「妥協」之下的文物出版事業，凸顯專業的存在價值，也讓《四庫》走上「去神聖化」的道路。誠如前述，《四庫》象徵「朝代文化事業的光榮」，民初先以「古物」的面貌呈現於世人前，可是經此文字交鋒，庫書納入學術領域中討論，面紗一旦被揭開後，便不再懷有神祕、神聖之感。如謝國楨(1901-1982)說：

《四庫》書在一般社會眼光來看為高深莫測之物；自從有這一翻〔番〕討論，未始不可以使社會上明白是什麼一會〔回〕事，《四庫》影本未始不可以因此而銷路更多。——只〔至〕少可以說在選擇上，可以得到比較精審的結果。¹⁰²

謝氏語及「精審」二字，刻意強調專業之訴求，也說明現代社會裡專業群體如何成爲國家建設的一環。

四、民族主義與「知識政治」：戰火陰影下的《四庫》

《四庫》刊印出現爭議，非惟知識界有關「專業」的訴求而已，在 1930 年代「國難」及民族精神昂揚裡，它同樣是各種勢力在文化與政治的場域中相互較勁之利器。從掌握「象徵性行動」(symbolic action)的角度觀之，¹⁰³統治者擁有這項歷史文物，不啻獲得權力象徵，同時也展現自身國力或正統性，更是認同的來源。

(一)「滿洲國」翻印文溯閣本

清末民初時期，日人便相當關切中國飽受戰爭肆虐的文物典籍及其動向。

¹⁰¹ 〈圖書文化消息·教部景印四庫全書近訊〉，《浙江圖書館館刊》，卷 2 期 5 (1933 年 10 月)，頁 25。

¹⁰² 謝國楨，〈評「再論名流與景印四庫珍本」〉，《時代公論》，卷 2 期 29，頁 16。

¹⁰³ 這裡是借用 Kenneth Burke 所提出語言和社會關係的概念。見 Kenneth Burke, *On Symbols and Societ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 77-85.

以《四庫》爲例，內藤湖南(1866-1934)在義和團事件發生之際，曾呼籲搶救即將被人們摧毀的古本典籍，更於明治末年親自動身前往中國東北，探訪文溯閣本。¹⁰⁴「五·四」後不久，日本東北大學法學文學部教授武內義雄(1886-1966)經由懷德堂資助，以邵懿辰(1810-1861)《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爲指引，分別前往各處典藏的圖書館，對文津、文溯、文瀾等閣本進行查訪。¹⁰⁵而到處尋探、蒐羅這些文物蹤跡，除了自身熱愛中國古典文化的因素外，不免令人聯想有其侵略之目的。因爲隨著戰爭的開展，非僅純屬軍事之進行，它還兼有掠奪「戰利品」和文化財產等功能及意義。¹⁰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關東軍趁機侵略中國東北，從而牽動文物所有權的問題。尤其當「滿洲國」宣告成立後，文物遺產的歸屬頓時白熱化；文溯閣本即在此一情形下，再度成爲眾所矚目的焦點。1932年4月，關東軍將張學良在瀋陽之舊邸改爲「國立奉天圖書館」，由「滿洲國」參議府參議袁金鎧(1870-1947)兼任館長，¹⁰⁷接收原屬東北大學藏書。之後，又把東方相關之文獻及新購的《李朝實錄》等，送交典藏，提供少數學者研究利用，並不對外公開。¹⁰⁸文溯閣本遂爲該館最重要的典藏之一，就像《奉天圖書館案內》的介紹提到：

〔四庫〕全書共寫八部〔引者按：爲七部之誤〕，爲永遠之留傳。其後因內訌外釁，已焚失遷移殆盡；而仍存於原地者，只我文溯閣一處而已（北京文瀾閣一部下落不明，熱河文津閣一部則殘存於北京）。是則在我滿洲者，對於世界上實堪自詡爲一偉大國寶也。本館有鑑於此，爲防火災、蠹蝕等患，而建築新式鐵筋型新書庫，講求設備之萬

¹⁰⁴ 內藤虎次郎，〈奉天訪書談〉，《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昭和45年[1970]），卷12，頁301。

¹⁰⁵ 武內義雄，〈燕京讀書記—清朝學術史〉，《武內義雄全集》（東京：角川書店，昭和54年[1979]），卷10「雜著篇」，頁13。

¹⁰⁶ 松本剛，〈略奪した文化〉（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13-17。

¹⁰⁷ 〈館務要錄〉，《國立奉天圖書館季刊》，期1（1932年12月），頁1-2。

¹⁰⁸ 〈國立奉天圖書館概況・附暫行閱覽規則〉，《國立奉天圖書館季刊》，期1（1932年12月），頁4。

全，而努力於保管方策。¹⁰⁹

其中「在我滿洲者，對於世界上實堪自詡為一偉大國寶」之語，可見《四庫》做為「滿洲國」正統權力的象徵。

統治者對文物擁有的權利，不獨說明自身具備合法性的來源而已，更有意義的是將之出版，公諸於世，投射成一種「文化解釋權」。從這一點來看，舊文物的功能非惟聯繫「過去」種種，還確立「現在」存在的意義，甚至藉以凝聚認同之價值。1933年，「滿洲國」為了慶祝建國一週年紀念，當局決定翻印《大清歷朝實錄》及文溯閣本，並由新組成的「日滿文化協會」襄助，通過日本對華文化事業部門合作來進行。¹¹⁰

（二）中國輿論的反彈

這一連串文物出版之舉，自然引起中國文化界不小的震撼，情形不亞於東北國土淪亡的喪痛。許多民間輿論紛紛對此表達看法，高喊維護文物的口號，也充分說明戰火陰影下所謂「知識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的意涵。

就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代表南京國府官方立場的《中央日報》，率先以醒目標題揭示文溯閣本「被日盜去」，發出不平之鳴。¹¹¹接著1932年12月，日本圖謀華北愈急，發動「榆關事變」，遂使雙方軍事、外交關係格外緊張。北平圖書館為了應付這突如其來的狀況，開始未雨綢繆，打算將館藏之宋元善本書籍及文津閣本全數裝箱，以備不得已之際隨時遷往他處。¹¹²至於1933年教育部毅然決定刊印文淵閣本，不妨視為這場試圖爭取文物遺產的比

¹⁰⁹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奉天圖書館編，《奉天圖書館案內》（奉天：編者印行，康德8年[1941]），頁2-3。

¹¹⁰ 〈翻印清實錄及四庫全書〉，《黑白》，卷2期6（1934年9月），頁47。鄭孝胥日記中也有相關的記載。譬如，1934年12月17日通過國務會議，追加印價共28萬元，印三百部。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總頁2561。相關討論請參見岡村敬二，《日滿文化協會の歴史——草創期を中心に》（京都：作者印行，2006），頁121-122。

¹¹¹ 〈惜哉！四庫全書被日盜去〉，《中央日報》，1931年10月1日，第1張第3版。

¹¹² 清茅，〈古物南遷中四庫全書之保存問題〉，《北辰雜誌》，期2（1933），頁19-23。

賽而來。¹¹³

例如，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1888-1979)曾在事後不忘提到：

《四庫全書》的影印，十餘年來經高夢旦先生等擘畫，功敗垂成者兩次。……商務印書館復業未久，重版待印的書極多，新版待印者數量也很不少，故就經濟能力和生產能力言，本不必擔任此項工作，但以此事計畫多年，功虧可惜，而且鑑於《四庫全書》因東省之淪亡又已喪失一部，及今而不速將孤本先行影印，將來文獻散佚，與文化至有關係，故不顧困難，遂與訂約印行。¹¹⁴

他對日人在東北國境掠奪文物，深表遺憾。而王氏懷憂的言論行止，非惟一人心聲，亦是時代共同的反響。

當然教部不惜將文淵閣本遷運南方，概允商務印書館出刊，藉由影印以博取聲名，自有「競逐」的意味存在。胡玉縉(1859-1940)高談印行《四庫》之舉時，直言：「現文淵文津兩本雖無恙，而事變所亟，實亦可危。〔商務〕印書館倘能承印全部，即予以版權，似未嘗不可。……我不能為，而文溯閣本他人或印行之，將流入內地也。雖曰『文化無國界』，屆時我亦靦顏曰『文化無國界』乎？」¹¹⁵胡氏痛心疾首所參照的對象，就是在東北的文溯閣本。即連吳豐培(1909-1996)「聞羅叔韞（按：羅振玉）擬將文溯閣《四庫全書》付印」，反觀教部、北圖為「書」與「本」的問題爭擾不休，也不禁說一旦選印「若成事實，則我落其後，蓋同一照原書影印，彼則全書，此則不全之書，不知者，震驚其全書之宏富」，¹¹⁶顯見內心對此「文化解釋權」的爭奪，不免有「力猶未逮」之焦慮感。

不僅個人如此，民間團體看待影印《四庫》爭議時，也無法忽視「知識政治」的問題。就像浙江圖書館發出嚴重聲明，謂「日人竟已越俎謀之」，實為

¹¹³ L. Carrington Goodrich, "China's Greatest Book: (The Ssu K'u Ch'uan Shu)," *Pacific Affairs* 7:1, p. 70.

¹¹⁴ 王雲五，〈兩年的苦鬪〉，收入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413。

¹¹⁵ 胡玉縉，〈抽印四庫全書罕傳本感言〉，《北平晨報》，1933年9月1日，第13版。

¹¹⁶ 吳豐培，〈影印四庫全書罕傳本私議〉，《北平晨報》，1933年9月12日，第12版。

「國際大盜」：

最近教部倡印《四庫全書》，雖已為空谷足音，難能可貴，但因限於貲力，猶僅勉選其尤，枝節為之，全部翻印，殆如俟河之清，設二年後或不俟二年後而東倭竟從史傀儡，着我先鞭，則其為「維罍之恥」，又當何如？而此次討論景印《四庫》者，所以多亟圖進行，蓋亦不為無見也。¹¹⁷

1933年11月17日，喧嚷一時的刊印《四庫》爭議終於塵埃落定，由央圖假上海天主堂街故宮辦事處先行攝影，然後讓商務印書館攜回印刷局，再行製版編印。¹¹⁸直到兩年後，整件工作總算底定。除了原來央圖打算交換出版品的目標業已達成外，¹¹⁹教育部對內還要求各機關單位、學校團體的圖書館預購，¹²⁰對外也以此進行敦睦邦交。根據報載，曾獲分送《四庫》珍本的國家，歐洲方面像是德國，因設有中國學院，故得以分贈兩部；其餘如義、法、英、俄、西班牙、瑞士等國家，則各贈一部。¹²¹至於對南京國府而言，選印《四庫》珍本，非特促進外交事務，同時也被視為1930年代「黨治」下重要的政治成績之一。¹²²

（三）文瀾閣本的爭奪始末

接下來，本文還要藉著另一部《四庫》在抗戰中搬遷的故事，強化「知識政治」之意義。這部庫書便是原先度藏在杭州的文瀾閣本。

文瀾閣創建於1782年，在1861年因太平軍攻占杭州而倒塌，所藏的《四

¹¹⁷ 〈圖書文化消息·日偽擬印清朝實錄與文瀾閣四庫全書〉，《浙江圖書館館刊》，卷2期5（1933年10月），頁26。

¹¹⁸ 〈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四集共計二百三十二部業已在滬開始攝影〉，《中央日報》，1933年11月20日，第2張第3版。

¹¹⁹ 〈國立中央圖書館分贈各國四庫珍本〉，《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卷16期1·2合刊（1941年10月），頁16。

¹²⁰ 譬如北平地區的鐵路學院即有公文函。見〈教育部秘書處致本院函為請訂購預約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等書由〉，《鐵路學院月刊》，期9（1934年4月），頁15-16。

¹²¹ 〈教部贈送歐洲各國四庫全書〉，《申報》，1935年6月7日，第3張第12版；戈寶權，〈四庫全書珍本與列寧圖書館〉，《中蘇文化》，卷1期2（1936年6月），頁1-2。

¹²² 中央統計處編，《中國國民黨指導下之政治成績統計》（南京：編者印行，1935），頁45-46、99-100。

庫》於是散落民間。經由藏書家丁申(1829-1877)、丁丙(1832-1899)兄弟多方努力之下，搶救了一部份典籍，1881年時再度存入修復後的文瀾閣。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省諮議局議決將文瀾閣本撥歸浙江圖書館，遂移至該館在孤山的新館址。1915-1925年期間，先後兩任的圖書館館長錢恂(1853-1927)和張宗祥(1882-1965)，接連發起補抄運動，經過他們共同奮鬥，終於使得文瀾閣本補齊，總冊數達 36,278 冊。¹²³

1937年底，日軍攻陷杭州，文物保存成爲刻不容緩的課題。不久，日方組織「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負責相關事宜。1938年2月22日，日方暗中派出九名工作人員，從上海一路抵達杭州，調查文瀾閣本下落，但毫無斬獲。¹²⁴究竟這部日軍遍尋不得的文瀾閣本，怎能在抗戰期間躲過敵人魔掌？由於流傳下來的資料不多，如今僅從少數幾位參與者的日記和回憶裡，重構當時梗概。

早在「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不久，有識之士考慮各地重要文物的存放課題，積極處理搬遷事務。當時，滬杭線之間屢有日本飛機肆擾，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陳訓慈(1901-1991)，唯恐館內的文瀾閣本被炸燬，於是謀思遷運，躲避戰火。1937年8月，經由編纂員夏定域(1902-1979)介紹，選擇將文瀾閣本暫存於富陽的漁山鄉。10月，由於敵機轟炸實在猛烈，砲火頻繁，旋議改遷至建德。等到12月24日杭州淪陷後，乃由教育部令示將文瀾閣本遷往貴陽，直到1944年始入四川重慶。嗣後抗戰結束，1946年7月5日才返杭州。

這一段備嘗艱辛的歷程，如今大致呈現在親身參與者毛春翔(1898-1973)的報告書中。¹²⁵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人們對文瀾閣本的重視及捨棄與否，政

¹²³ 這段史實大略情況，詳參張宗祥，〈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史實〉，收入浙江省圖書館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省圖書館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263-270。

¹²⁴ 大佐三四五，〈占領地區に於ける圖書文獻の接收と其整理事業に就て〉，《圖書館雜誌》，年 32 號 12（昭和 13 年[1938]12 月），頁 338。

¹²⁵ 毛春翔，〈文瀾閣四庫全書暫時播遷紀略〉，《圖書展望》，復刊期 3（1947 年 4 月），頁 29-31。毛春翔是浙江省衢州人，1931 年經人介紹至北平圖書館工作，從此專心研究圖書古籍。1933 年，他改到浙江圖書館擔任善本編目員兼孤山分館主任幹事，嗣後有機會參與文瀾閣本搬遷事宜。其生平見江山城關鎮志辦公室主編，朱雲亨編，《江山城關鎮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治因素仍係最關鍵的考量。例如，最先存置在富陽期間，是借居於當地的富商趙坤良家中。據毛春翔的筆下形容，趙氏頗「富有資產，待人和善，號召力強，一聲令出，數百挑夫立至，故搬運書籍，毫不費力」。其時趙氏家居在新建大廈，舊宅廢棄未用，故決定以此藏匿文瀾閣本，隨扈人員並行照應。¹²⁶可是，隨著戰火逼近，時局激變，趙坤良開始擔心自己的安危，故「不肯度藏，存懷璧其罪之戒」。¹²⁷從現存的「陳訓慈日記」中，可以看到：本來承平之際，保護文物是人人有責，然而歷經無情戰禍的摧折，卻使人心陡變，害怕「懷璧招罪」遂為新的求生準則。¹²⁸

面對緊迫危殆的時局，陳訓慈相當瞭解文瀾閣本的重要性。日記裡他充分傳達此一心聲：

余言《四庫》七閣，洪楊後已反其四。自東北淪陷，傳日人運文溯書之東京，於是浙之文瀾已與文淵、文津鼎足而三。北平圖書館為時局故，曾以善本運滬，文津書仍在平，今亦陷敵，保持可慮。而文淵書為影印，底本存滬某圖書館，不知曾否運京？如未果，則租界政權岌岌可危，此書亦可捆載而東。是文瀾什八抄殆成此，前代結集之大叢書之僅存碩果矣！¹²⁹

「傳日人運文溯書之東京」一語，談的是報載關於日方特地雇用字匠抄錄文瀾閣本，然後將抄本運赴日本國內，且有謠傳文物付之一炬。¹³⁰從引文的這段話推知：現存的四部庫書，唯獨文瀾閣本仍未陷敵手，其餘生死未卜。因此，為

社，1991），頁315-316。

¹²⁶ 引文俱見毛春翔，〈文瀾閣四庫全書暫時播遷紀略〉，《圖書展望》，復刊期3，頁29。

¹²⁷ 陳訓慈撰，徐永明整理，〈《陳訓慈日記》中有關文瀾閣《四庫全書》抗戰遷徙事摘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10期1（2000年3月），頁264，1937年11月23日條。

¹²⁸ 就我所見，陳訓慈的日記還有類似的記載。譬如1937年12月18日條提到：「山農畏藏公物，如懷璧招罪而引敵也。聞山中人已傳吾等運來書中有數箱置鈔幣，故尤引為畏懼」，可見民情一斑。引見陳訓慈撰，徐永明整理，〈《陳訓慈日記》中有關文瀾閣《四庫全書》抗戰遷徙事摘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10期1，頁270。

¹²⁹ 陳訓慈撰，徐永明整理，〈《陳訓慈日記》中有關文瀾閣《四庫全書》抗戰遷徙事摘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10期1，頁268，1937年12月1日條。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¹³⁰ 〈偽滿之形形色色〉，《東南日報》，1937年11月19日，第2版。

了安置文瀾閣本，陳氏煞費苦心，不但安排合適的藏匿地點，又設法籌措運費，曾向友人張其昀(1901-1985)借貸，自言此事「應付頗不易」。¹³¹在苦無對策之際，幸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1890-1974)仗義相助，透過情誼致電給教育部長陳立夫(1900-2001)，強調文瀾閣本碩果僅存之重要，建議運往內地。最後得到教部首肯，文瀾閣本才能安然無恙地搬至貴州貴陽。¹³²

妥善存放在貴陽的文瀾閣本，終於避開日軍追蹤，得以安置。¹³³儘管沒有敵人立即侵擾之危，該部庫書仍然成爲爭奪焦點，展露「知識政治」的一面。相傳當時某位人士考慮動用私下關係，「想留這一部書在貴陽」，理由是「貴州偏僻，讀書難」；而相對之下，如果將來把《四庫》歸返杭州，意義不大，蓋「江浙文化高，與北京交通亦便，北京尚有《四庫》書兩部在，所以要留文瀾在貴州」。¹³⁴這樣的理由看似冠冕堂皇，但亦可想見文瀾閣本超乎文化實質的利益，造成各方角力激烈。其後，對日戰事一度升高緊張，文瀾閣本引起國府關注，決定自貴州改遷四川重慶的青木關，此議遂息。

更能凸顯《四庫》本身「利益價值」及地方認同，是戰時重慶發起的「保管委員會」。當文瀾閣本預備運往重慶之際，謠傳央圖有意爭取此書館藏。身爲浙江人的竺可楨，聽聞此一消息後，發出嚴正聲明，強調「文淵、文津可歸中央」，但「文瀾則以歷史上之關係，戰後必須遷回杭州」。¹³⁵爲了審慎處理

¹³¹ 陳訓慈撰，徐永明整理，〈《陳訓慈日記》中有關文瀾閣《四庫全書》抗戰遷徙事摘錄〉，頁269，1937年12月10日條。

¹³² 現已出版的竺氏日記有所略記。根據報導，文瀾閣本剛開始存放在省立貴陽圖書館，後以慎重起見，改遷至城外張家祠堂，但飽受轟炸之虞，始決定放置在山中某洞，外人鮮知。俱見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6（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竺可楨日記》，頁458（1938年1月22日）、頁504（1938年4月14日）各條；祝文白，〈兩次查看內運文瀾閣四庫全書記〉，《真理雜誌》，卷1期1（1944年1月），頁116。

¹³³ 就1942年日本興亞院委託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的調查顯示，至少當時僅有文瀾閣本經浙贛鐵路移至「西南某省」的消息，其餘則一概未知。見興亞院華中連絡部編，《重慶側の文化機關並に文化人の動靜》（出版地不詳：編者印行，昭和17年[1942]），頁244。

¹³⁴ 張宗祥，〈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史實〉，收入《浙江省圖書館志》，頁270。

¹³⁵ 「省教育廳致教育部快郵代電：將四庫全書運杭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五，卷號11623，未見，引自吳忠良，〈陳訓慈與文瀾閣《四庫全書》〉，《蘭臺世界》，2009年第11期，頁44；竺可楨，《竺可楨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卷9，《竺可楨日記》，頁240，1944年12月9日條。

文瀾閣本的歸屬權，1945年2月浙江省旅渝人士遂組織保管委員會，得到教育部許可，並延聘徐青甫(1879-1961)、余紹宋(1882-1949)、竺可楨、陳訓慈、蔣復璁、顧樹森(1886-1967)、賀師俊等人為委員。據陳訓慈事後供稱：成立委員會之目的，乃「以保管妥善為理由，實際是預為以後原璧歸浙之地」。¹³⁶換句話說，戰時大後方有關文瀾閣本的去留與否，仍扮演一場「中央」和「地方」爭奪文物產權的戲碼。等到抗戰結束，儘管「川黔方面有主張留文瀾於成都者」，但保管委員會嚴陣以待，迅速議決運送庫書返抵杭州。¹³⁷由此不難想見，基於地方認同及利益糾葛，文瀾閣本同樣在「知識政治」光譜上產生作用。

結 論

回顧《四庫》在民國時期的命運及發展，宛如一場中國從朝代帝國蛻變為民族國家的寫照。這部經由朝廷官修的鉅幅叢書，其編纂本有「政治凌駕文化」的目的，奠基在皇帝一人的意志之下而成。但是民國以後，昔日的「朝廷文化事業」光環褪去，搖身變為共和政府外交及政治工作的籌碼，乃至是統治者鞏固國家認同和政權正當性的工具。

在此一現代國家建設的歷程中，我們不能忘卻印刷資本主義居間扮演的角色。商務印書館屢次參與刊印《四庫》事業，無論主動或被動，都以「保存國粹」為主軸進行文化生產，提供閱讀群眾形塑國族認同的園地。由於出版印刷等物質條件之擴散，《四庫》不再僅有文物的歷史價值，而成為「發揚國光、傳播文化」的利器，同時凝聚國民共同向心力。上述這些受惠於「圖書館運動」、國府「中央化」及「國難」民族精神的昂揚，官方與出版業者在互動下締造了

¹³⁶ 張宗祥，〈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史實〉，收入《浙江省圖書館志》，頁272-273，陳訓慈「附記」部份。

¹³⁷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9，〈竺可楨日記〉，頁526，1945年9月26日條。有篇文章也提到「勝利後，兩浙人士曾屢次電懇教育部將該書全部運回，以重東南文獻，終以交通困難，延至三十五年春季，始決議起運」，得見其中梗概。見徐伯璞，〈文瀾閣四庫書歸閣散記——從重慶到杭州〉，《教育通訊（漢口）》，復刊卷2期2（1946年2月），頁20。

出版《四庫》之契機。

《四庫》最終以選印「珍本」的方式出版，除了達成預期的政治、外交目標外，亦促使研究《四庫》的內容、校讎、版本等學問，逐步邁向知識專業化的道路上。儘管 1933 年時，知識界對「是否刊印」的認知有所歧異，甚至為此展開爭論，但也進一步提供如何實踐新的圖書知識之功能。在過程裡，傳統的版本學眼光和知識體系雖未動搖，卻投身在新學術、新媒體、新工具的大蠱之下，由一群受過西方教育訓練的學者重張旗鼓。北平圖書館的學者憑藉著目錄學和圖書知識，向教育部及中央圖書館提出反對刊印的意見，固然有其學理根據；不過，其中也存有各種勢力、利益及「爭勝」之糾葛。是以，最終形成認同，實際上並非永無進展而停滯的整體，它毋寧為一動態過程，由不同差異群體歷經彼此爭持、協商後的結果。我們當然別忘了：呈現在這些爭論之後的，正是經由「包裝」而產生的「知識」。

近代中國學習西方道路的同時，知識社群曾扮演相當積極的角色。他們將所學的專業公諸於世，貢獻一己之力，既標榜自己獨立精神和職業道德，又透過集眾力量參與公共事務，甚至主導政府決策。¹³⁸然而，當吾人探究任何知識的發展經驗時，那些組織、機構發揮之影響力，也是不容忽視的面向。誠如彼得·柏克(Peter Burke)告訴我們：「知識的機構脈絡，是〔瞭解〕知識歷史一個必要的部份。」¹³⁹以 1933 年出版《四庫》的爭議為例，北圖、央圖各執己見，實際上這兩座圖書機構成立的時代脈絡，正是分別由列強（美國、英國）退還庚款，從屈辱中重新建立而來的現代學術專業。

此外，國家民族危機的發生，也提供文化認同的轉機；1930 年代《四庫》之處境，猶如逝去的木乃伊歷經重生，成為形塑國家意識或地方認同之遺產。姑且不論處於敵對的中日兩國，還是代表省籍區域的利益，夾帶著歷史與記憶的《四庫》，等同一項合法性根源之所在。特別處在戰火蔓延的 1930 和 1940

¹³⁸ Xiaoqun Xu,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1912-1937*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74-75.

¹³⁹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p. 32.

年代，文物更成爲彼此爭奪及其建立霸權的憑據。¹⁴⁰然而，與其他人類文明的歷史不同，日本採取的策略不以摧毀敵人文化爲目的，反倒以掠奪敵人的資源，做爲自己統治正當性之基礎。

《四庫》以「文物」價值的面貌出現，繼續肩負其任務，不因中日戰爭的結束而止。國共兩黨進行「接收」期間，東北文物旋即成爲關注對象，文溯閣本也是重點所在。¹⁴¹等到國際冷戰局勢開始，這部叢書依然是政治和文化的宣傳工具。196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關係交惡，在邊境不安與動員備戰的情景下，遼寧省文化廳首次向中共中央提議，將文溯閣本調往他地，另覓保管場所。經過一年考量及規劃，指定由甘肅省文化局辦理，並由該省圖書館負責接收與保管事宜。終於在1966年9月，接收小組成員趙學義等人親赴瀋陽進行交接，直到10月才抵達甘肅，暫放於魯土司衙門。1971年，撥款十七萬五千元人民幣所興建的專庫，終於在榆中縣甘草店落成。文溯閣本被秘密遷往此處，存放長達三十四年後才公諸於世。¹⁴²

無獨有偶，來台後中華民國政府也對《四庫》進行一場文化與政治互用的大戲。1966年，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國民黨積極以「精神動員」回應，同時推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爲了表彰自己才是承繼文化道統，同時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古籍今註今譯的工作，由專責機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陸續邀請學者專家，從事編印出版計畫。¹⁴³這項工

¹⁴⁰ 當然《四庫全書》僅是一例而已。譬如：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陽市的農地中出土的司母戊鼎，伴隨著古代傳說而成爲不同政權覬覦的對象。在戰時，日本人聞訊，有意索取，該文物被當地村民重新掩埋，直到戰後1946年才被掘出，用來祝賀蔣介石六十壽禮。等到1949年政權丕轉，因港口起重設備不足，司母戊鼎未能隨其他文物渡海至台灣。其後，中共爲慶祝建政十週年，重新規劃在天安門廣場展示，又將司母戊鼎迢迢由南京運至北京，安置在新建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內。相關討論，見 Lillian Lan-ying Tseng, "Myth, History and Memory: The Modern Cult of the Simuwu Bronze Vessel", 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1901-2000 中華文化百年論文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9），頁 717-767。

¹⁴¹ 〈蔣復璁瀋陽歸來談接收東北文物，圖書館內四庫全書無恙，共軍劫古物博物館受損〉，《中央日報》，1946年9月3日，第4版。

¹⁴² 姜洪源，〈文溯閣《四庫全書》遷往甘肅始末〉，《中國檔案》，2007年第6期，頁42-43。

¹⁴³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頁142-150。

作還促成日後籌印《四庫》的動機。1968年11月29日，由監察委員曹啓文等人在監察院院會中發起議案，敦請行政院出版《四庫》，「以宏文化基業」。根據報稱，提案中建議政府設立《四庫》的籌印機構，按照傳統四部經、史、子、集分類，每半年或一年刊印一種。印刷經費除了由政府預算按年編列外，如感財力不足時，可逕自發動出版業或書局進行投資，組織公私合營公司，出版之後將廉價供應世界各大圖書館，以廣流傳。當時院會歷經多番討論，決定送交教育委員會處理。¹⁴⁴整部影印文淵閣本的工作，在台灣商務印書館配合下，於1982年陸續完成。¹⁴⁵上述兩件看似毫無關連的事件，不約而同地指出《四庫》的歷史意義：雖然隨著時空的因緣而起滅，但不變的是它所肩負凝聚認同的任務。

¹⁴⁴ 〈監委促請政院籌印四庫全書〉，《聯合報》，1968年11月30日，第2版。

¹⁴⁵ 蔣復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序〉，《珍帚齋文集》，卷2下，頁931-936。1999年底，數位化電子版的文淵閣本，在北京、上海、台灣、香港相關人員及學者的共同努力下開發完成，引起廣泛關注，也刺激日後文瀾、文溯閣本與其他相關圖書的電子版開發，還有檢索技術的改善。俱見李常慶，《四庫全書出版研究》，頁170-186。

Old Documents, New Identities: *The Siku Quanshu*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Lin Chih-hung*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Treasuries* (*Siku Quanshu*, SKQS)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enormous compilation was not limited to the Qing dynasty, but remained central to Republican China. Originally a symbol of imperial glory, the SKQS become an item of national heritage. This article first outlines the process from documents to publication in which the SKQS lost its original sacred significance. Second, it discusses the politics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a time of nationalism and war, during which publication of the SKQS contributed to national identity. Third,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profession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tate-building in the 1933 publication of the SKQS. Finally, SKQS is linked directly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strengthening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the SKQS in the Republican era was integral to China's transformation into a nation-state.

Keywords: *The Siku Quanshu*, Commercial Press, Yuan Tongli, Jiang Fucong, national identity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